

Harold Innis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
展江 何道宽 主编

传播的偏向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中文修订版·英文（双语版）

[加]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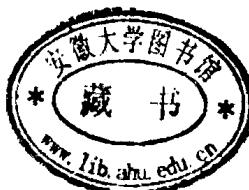
师系列

传播的偏向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中文修订版 · 英文(双语版)

[加]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的偏向/(加)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一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2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

ISBN 978—7—5657—0624—0

I. ①传… II. ①伊… ②何…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5999 号

传播的偏向

著 者 [加]哈罗德·伊尼斯

译 者 何道宽

策划编辑 司马兰 姜颖跃

责任编辑 姜颖跃 张 璞

封面设计 运平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624—0/G · 0624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持下，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十来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有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著作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还是不被承认科研工作量的。这就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续这一事业，尽管也出现了像刘海龙这样的优秀青年译者。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前说的两个 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 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 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烘托了和滋润了年轻学子，令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还另附英文全文，以便读者查阅。“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展江

2012 年 11 月 20 日

2 传播的偏向

目 录

| | |
|-----------------|-----|
| 修订版译者序 | 1 |
| 译者序 | 11 |
| 麦克卢汉序 | 23 |
| 作者前言 | 35 |
| | |
| 第一章 密涅瓦的猫头鹰 | 37 |
| | |
| 第二章 传播的偏向 | 71 |
| | |
| 第三章 时间的诉求 | 100 |
| | |
| 第四章 空间的问题 | 132 |
| | |
| 第五章 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 | 174 |
| | |
| 第六章 18世纪的英格兰出版业 | 184 |
| | |
| 第七章 美国的技术和公共舆论 | 200 |
| | |
| 第八章 挑剔的批评 | 238 |

| | |
|--|-----|
|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 245 |
| Preface | 247 |
| Minerva's Owl | 249 |
|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 280 |
| A Plea for Time | 310 |
| The Problem of Space | 343 |
| Industrialism and Cultural Values | 387 |
| The English Publishing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397 |
| Technology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412 |
| "A Critical Review" | 450 |
| Appendix I A Note on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magnetic Resources in North America | 457 |
| Appendix II Adult Education and Universities | 461 |
| 译后记 | 475 |
| 修订版译后记 | 477 |
| 译者介绍 | 479 |

修订版译者序

一、从头说起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决定用汉英双语版的形式推出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A. Innis, 1894—1952) 的传播研究三部曲：《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司马兰和姜颖昳女士希望我担此重任，我欣然从命。

按照初版问世的时间，这三本书的排序是：《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 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1952)。

半年多来，我翻译这三本书的顺序却有所颠倒，依次是：《变化的时间观念》——《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为什么不按照原书的出版顺序翻译呢？原因是：

(1)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是伊尼斯人生的最后一本书，送到他的病榻时，他只能摩挲，不能翻阅了。这是他传播研究三部曲的完美总结，我迫不及待地要研读并翻译他的压轴之作。

(2) 《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两者相比，《帝国与传播》长于考证，最能体现伊尼斯的治学风格，《传播的偏向》偏重理论辨析，两

相比较，《帝国与传播》的知识更密集、语言更难。我决定“先难后易”。

(3)《传播的偏向》理论最厚重，我想将其作为我翻译他这个三部曲的压轴之作，借撰写中译本第二版译者序的机会再次梳理他的传播理论和媒介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他奠定基础。

二、如何说起

十余年来，我论述伊尼斯的文字数篇，已有几万字，还有话可说吗？若有，又该如何说起呢？颇费思量。

这些文稿有几篇是序文：《〈帝国与传播〉译者序》、《〈帝国与传播〉修订译者序》、《〈传播的偏向〉译者序》、《〈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译者序》、《〈媒介环境学〉译者序》、《〈技术垄断〉译者序》。

还有几篇是论文：《多伦多的双星》、《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媒介环境学辨析——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二》、《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三》、《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媒介环境学评论之四》、《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

尚有两篇译文是两位大家论述他的文字，下文将予以介绍。

以上文稿和译文介绍了伊尼斯的学术背景、学术转向和理论贡献，却没有涉及他这个三部曲的内在关系。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讲起。

三、三部曲精要

在学术思想和文字风格上，《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这个三部曲有几个突出的特征。(1)“帝国论”和“偏向论”始终如一；(2)其文风凸显考据癖好，严谨、紧凑却又跳跃；(3)均为讲演稿的集结，并非专著；(4)推崇文明的口语传统，伊尼斯尤其偏爱古希腊口语传统，但这些讲演稿却是典型的书面语和学究体。

在思想发展上，这个三部曲步步深入。《帝国与传播》提出“两论”，《传播的偏向》建构、拓展并阐释“两论”，给西方文明敲响警钟，《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深化“两论”，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

篇幅短小，思想厚重。三本书均不到 20 万字，思想却浓缩得难以理解、难以消化。

四、文字风格解密

伊尼斯的三部曲均是小篇幅、大文章，难以卒读。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难懂的老师。麦克卢汉乐意将自己的著作作为伊尼斯的注脚。他又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他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密集、浓缩、丰富。他的思想节奏快，多跳跃，给人留下大量思索的空间。

我们撷取几段文字予以说明。

他用媒介的偏向扫描并阐述人类传播史，只用了三百余字：“我这篇讲话按传播媒介将历史分为以下若干时期：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开始的泥版、硬笔和楔形文字的时期；从埃及的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和圣书文字到希腊—罗马时期；从苇管笔和字母表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羊皮纸和羽毛笔到 10 世纪或中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羽毛笔和纸张的使用相互交叠，纸的应用对印刷术的发明更为重要；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纸张和毛笔以及欧洲使用纸张和羽毛笔的时期；从手工方法使用纸张和印刷术到 19 世纪初这个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时期；从 19 世纪初的机制纸和动力印刷机到 19 世纪后半叶木浆造纸的时期；电影发展的赛璐珞时期；最后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的电台广播时期。在每一个时期，我都试图追踪，传播媒介对于知识的性质有何含义，并试图说明，知识的垄断或寡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平衡就扰乱了。”^①

他讲述造纸术对中国文明、西亚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影响，也只用了几百字：“印刷术的出现就适应了佛教的需要，所以它对大众具有吸引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1—2 页。（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下不一一标明。）

力。同时，印刷术也适应儒学的需要，儒学的兴趣在经典，经典是读书人需要的文献。因为汉字复杂，所以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大量经书的印行，都需要国家的支持。第一本雕版的经书，是668年印制的。舆论受到严重的束缚，造成长期的动荡，引起改朝换代，导致蒙古人的征服。然而，口头传统的韧性给中国的制度和文人赋予巨大的力量……751年，阿拉伯人夺取土耳其斯坦。此后，纸传到了西方。巴格达成为造纸中心……9世纪中叶，纸进入埃及。10世纪，纸迅速传播开来。11世纪，用纸量迅速减少。纸张在12世纪进入西班牙，13世纪进入意大利。到14世纪末，纸在意大利的价格只及羊皮纸价格的六分之一。碎布是造纸的主要原料。用亨利·哈勒姆的话说，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垄断了莎草纸和纸张之后，穆斯林产生了对图书馆的兴趣，支持希腊经典的出版，尤其是支持亚里士多德和科学的传播。”^①

为了说明媒介和传播的偏向对上下数千年、纵横数千里的西亚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影响，伊尼斯只用了不到七百字：“我试图说明，传播的突然进展，是文化动荡的反映。黏土的使用有利于庙堂至上，突出了僧侣和宗教的作用。在巴比伦和尼尼微修建图书馆，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莎草纸有利于埃及政治组织的发展。在希腊，莎草纸和简化的字母表，促进民主组织、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继之而起的帝国，或将首都迁回到亚历山大城，或建都在其他地方，但是无论定都何方，图书馆始终是帝国君主力量的源泉。罗马发展了希腊的政治组织，强调法律，并最终突出帝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的首都以后，帝国的政治组织模仿东方的模式，尤其是在官方正式承认基督教之后。经典的完善，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大，使犹太人能够大难不死。他们凭借的力量，是《旧约》和书籍。反过来，基督教也利用羊皮纸和《圣经》手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14—15页。

抄本的优点。获取纸张以后，巴格达的穆斯林以及后来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穆斯林给西方世界送来这种新的媒介——纸。他们用纸来传播希腊科学。希腊科学和纸张促使人们用俗语写作。这就在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使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伊斯兰帝国的衰落意味着对科学的刺激。同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对希腊文学和哲学的刺激。印刷术重新强调书籍的作用，带来宗教改革的兴起。反过来，新的传播方法削弱了对书籍的崇拜，为新的意识形态开辟了道路。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建立起来，处于守势的力量需要这样的垄断或寡头。但技术的改进使处于攻势的力量得到加强，这就迫使力量的重组有利于俗语的发展。以武力治国占重要地位的时期，就出现文化的动荡。动荡之后又是平静，平静时期的法律又确保天下太平。马其顿的动荡和罗马的战争之后，罗马法随之发展，蛮族入侵随之结束。”^①

伊尼斯的治学风格极其严谨，注重考据，颇像清代的乾嘉学派，亦像20世纪的王国维、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国学大师。

他从研究经济史起步，善于考证，喜欢考证。注释不胜其烦、不厌其详。仅以《帝国与传播》为例，不到20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注释竟然多达534条。有趣的是，该书1950年问世时，注释只有277条。然而，从该书1950年问世到作者去世（1952）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居然加上了257条旁注！这些眉批旁注经过他夫人玛丽·魁尔·伊尼斯（Mary Quayle Innis）的整理，在后来的版本中，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繁琐”的考证和简约的文字似乎极其矛盾。何以至此呢？

他研究的是宏大的经济史和传播史，所以他不得不做足文献功夫，此谓“繁琐”。

三部曲成形于他病入膏肓前后。因为与死亡赛跑，所以他不得不把最丰富的思想浓缩为最短小的篇幅、最紧凑的句子。

和中国清代的朴学相比，他“酷爱”考据尤甚。他的文字不嫌其简，

^①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25页。

注释不厌其详。其突出特征及可能的解释是：（1）严谨学风使然，（2）恨不得在每一句话里压缩进最大限度的信息，（3）与死亡赛跑，以最精炼的篇幅端出他的“偏向论”和“帝国论”，没有时间用“大部头”展开细细阐述，（4）超常密集甚至长篇的注释，以便在正文之外尽可能给读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信息。

五、主要思想

有关伊尼斯的思想贡献，我在以前的文字里已经概括过好几条，不打算在这里重复。现用保罗·海耶尔（Paul Heyer）所著《传播与历史》（*Communications and History*, 1988）提供的资料归纳介绍如下：

（1）从贸易和交通运输的视角切入，研究历史尤其是加拿大经济史。

（2）首创“大宗产品”经济论，根据矿物、毛皮、木材、渔业、谷物、油气和水力等大宗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加拿大经济史，检讨因此而产生的贸易不平衡。

（3）用主导媒介的偏向进行历史分期。

（4）认为媒介与社会互动，造成文化偏向，对权力、文化、价值及社会制度施加影响。

（5）媒介的影响对社会发展起加速和促进作用，但其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

（6）用传播视角评价文明的特性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传播贯穿了社会的经济、文化和信仰体系。

（7）主导媒介决定文明的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所谓时间偏向是保存和延续传统的伦理和价值，所谓空间偏向是追求地域、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扩张。

（8）知识垄断。主导媒介促成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使权力受局限，并使之为特殊利益服务。

六、伊尼斯研究的新成就

最早研究伊尼斯的专著是一部传略：唐纳德·克雷顿（Donald

Creighton) 所著《伊尼斯画像》(Harold Adams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 1957)。

1994 年是伊尼斯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加拿大几所大学联手，隆重纪念加拿大这位学术泰斗的百年诞辰。在成熟的信息社会里、在数字时代的门槛上，它们重温伊尼斯的思想遗产。这次纪念活动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加拿大传播学季刊·伊尼斯纪念特刊》中。其他成果也陆续问世。

新世纪呈现出伊尼斯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

他的传播研究三部曲《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纸媒版和电子版继续出版，纪念他的专辑和传记也先后问世。

阿克兰 (Charles R. Acland) 等编著的《伊尼斯在新世纪》(Harold Innis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 1999)。

格伦·克拉克 (Glenn Clark) 著，《教育技术棱镜下的伊尼斯》(Harold Innis Through the Len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00)。

保罗·海耶尔 (Paul Heyer) 著，《伊尼斯评传》(Harold Innis, Critical Media Studies: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Culture, 2003)。

约翰·沃森 (John Watson) 著，《边缘人：伊尼斯阴郁的视界》(Marginal Man: The Dark Vision of Harold Innis, 2006)。

现有的几种伊尼斯传记中，海耶尔的《伊尼斯评传》最值得介绍，它精粹，学术含量高。

还有两篇文字值得推崇。

一篇出自保罗·海耶尔，是他《伊尼斯评传》的缩写本。这是他为林文刚 (Casey Man Kong Lum) 编撰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撰写的第六章，题名“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环境学遗产”，约 1.5 万字，分 5 节：通向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传播史、时间、空间和口头传统、知识垄断和文化批评、伊尼斯对媒介环境学兴起的持久影响和结语。林文刚为这篇文章所作的提要很到位：“以思想一纪传体的形式考察哈罗德·伊尼斯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检讨他的学问在媒介环境学理论视野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文章评介伊尼斯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成就，既按照其自身的面貌去评估，又

评估政治经济学给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的概念上的起点，探讨政治经济学如何有助于他探索传播媒介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伊尼斯对传播媒介的历史记述，被认为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基础，为研究传播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创新的研究路子。文章努力解释伊尼斯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关键的概念：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口头传统、知识垄断和文化的机械化。文章结尾审视伊尼斯对传播研究和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影响，简要分析其他学者如何利用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篇出自已故传播学名家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 1934—2006）之手，他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2003年版）写了一篇超长的序言（万余字），高度概括并肯定伊尼斯的杰出贡献，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1) 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个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巨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变化中的时间观念》，viii页）

(2) 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犹如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同上书，xii页）

(3) 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最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的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a) 北美的殖民和扩张，(b) 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同上书，xii—xiii页）

七、伊尼斯的再评价

多伦多传播学的双星是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伊尼斯略长，英年早逝

(1894—1952)；麦克卢汉（1911—1980）享年 69 岁，有幸预见到信息时代的来临。他捍卫和发扬了伊尼斯的思想和媒介理论，也独创自己特异单个的媒介理论。他们是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的杰出代表，形成交相辉映的双星。麦克卢汉研究经历了三次热潮，完成了三次飞跃。

然而，世人对伊尼斯的怠慢，却令人扼腕。

所幸的是，十年前我引进他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后，国内已经涌现出一批研究和弘扬伊尼斯思想的专著、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最突出的代表是北师大毛峰教授的《文明传播的智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容我振臂一呼、提醒学界：他的“偏向论”和“帝国论”，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批判是一座富矿，我们应当大力开掘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一并推出伊尼斯的传播研究三部曲，把这座富矿袒露在我们的眼前，有心采矿的人定会受益。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这个双语版的三部曲能够为急于寻觅英文本的读者提供便利。

我希望，中外学者呼应，深化伊尼斯研究，以挽回因我们曾经的怠慢而造成的损失。

我建议尽快引进海耶尔的《伊尼斯评传》。

进一步研究的首要着力点可以是：

- (1) 海耶尔对伊尼斯学术思想的小结，已如上述。
- (2) 被严重忽略了的伊尼斯批判思想。
- (3) 揭秘和诠释伊尼斯的文风。
- (4) 厘清伊尼斯传播三部曲的内在关系。
- (5) 揭秘和诠释伊尼斯为何“悲观”。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2 年 10 月 15 日

